

新二十八期

二〇一〇年五月

燕京學報

燕京研究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燕京研究院

燕京學報

新二十八期

主 編： 侯仁之

副 主 編： 徐蘋芳 丁磐石

編 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 丁磐石 王伊同 * 吳小如 侯仁之

* 夏自強 * 郭務本 * 徐蘋芳 張瑋瑛

張廣達 * 程毅中 * 經君健 * 劉文蘭

* 蘇志中

（* 常務編委）

編輯部主任： 郭務本

編 輯： 江 麗 李月修

北京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〇年五月·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燕京學報·新28期/侯仁之主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5

ISBN 978-7-301-17359-6

I. ①燕… II. ①侯… III. ①漢學-中國-叢刊 IV. ①K207.8-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116179 號

書 名: 燕京學報 新二十八期

著作責任者: 燕京研究院 編

責任編輯: 王春茂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7359-6/K·0701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電子郵箱: pkuwsz@yahoo.com.cn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編輯部 6275203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13.5 印張 212 千字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39.50 圓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郵箱: fd@pup.pku.edu.cn

本學報出版承美國哈佛燕京學
社資助。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Journal has been financially
assisted b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目 錄

說阜昌石刻《禹跡圖》與《華夷圖》	辛德勇(1)
清初“渾托和”考釋	定宜莊 邱源媛(73)
“五行”與“五常”的配法	李存山(125)
周禮與《小雅》部分詩篇的創作	祝秀權(147)
古今中西之間	
——陳垣與 20 世紀中國史學	陳智超(177)
塵世幾人還識我？	
——記政治學家、詩人吳其玉先生	吳學昭(203)

Contents

On Stone Inscriptions <i>Map of Yuji</i> and <i>Map of Huayi</i> in the Period of Fuchang	Xin Deyong(1)
A Decipherment of the “Huntuohe 渾托和” in the Early Qing Period	Ding Yizhuang and Qiu Yuanyuan(73)
On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of the “Five Elements” with the “Five Basic Virtues”	Li Cunshan(125)
Rites of the Zhou Period and the Creation of Some Works in the Book of Songs: “Xiao Ya”《小雅》	Zhu Xiuquan(147)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Present and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Prof. Chen Yuan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20 th Century	Chen Zhichao(177)
Notes on Politics Researcher and Poet Wu Qiyu	Wu Xuezhao(203)

說阜昌石刻《禹跡圖》與《華夷圖》

辛德勇

清末人葉昌熾在《語石》一書中論述存世石刻輿圖，謂其“最古者，惟偽齊阜昌之《禹跡圖》、《華夷圖》，開方記里，雖簡，實輿圖之鼻祖也”；葉氏復謂之曰：“唐宋以來地圖，莫古於此。”^①所謂“偽齊”，是指南宋高宗建炎四年至紹興七年間（金天會八年至天會十五年，公元1130～1137年），女真人在北方以劉豫為“子皇帝”樹立的傀儡政權“大齊國”，“阜昌”是“大齊國”唯一使用過的年號^②。事實上，葉氏當年見聞未周，所述亦欠詳確。存世古代石刻地圖，尚有北宋神宗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鑄刻的呂大防《長安圖》殘石，葉昌熾本人即曾收得拓片^③；而完整存世之北宋石刻地圖，則今陝西禮泉縣昭陵博物館尚存有哲宗紹聖元年游師雄主持刻製的《唐太宗昭陵圖》，清代中期以來廣泛通行的金石書目，如畢沅的《關中金石記》、孫星衍的《寰宇訪碑錄》以及王昶所纂《金石萃編》等俱有著錄^④，《語石》書中卻未嘗直接道及；另有北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上石的《九域守令圖》，葉氏當年亦未曾訪得^⑤。這三種石刻地圖的刻製年代，都要早于《禹跡圖》和《華夷圖》。不過，這並不妨礙阜昌石刻《禹跡圖》和《華夷圖》作為較早的傳世輿圖，在中國古代地理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更不影響它在歷史地理研究中的獨特史料價值^⑥。葉昌熾特別推重這兩幅地圖，正體現出其審視石刻碑版的廣闊學術眼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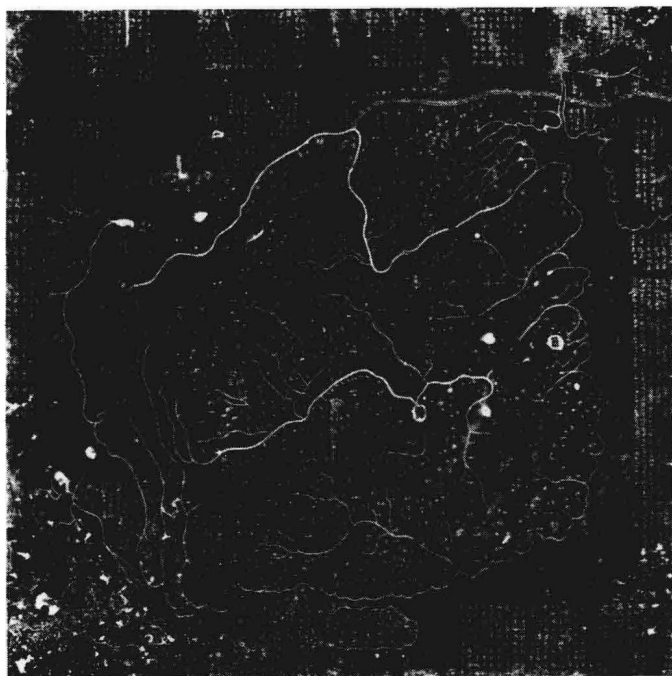
阜昌石刻《禹跡圖》和《華夷圖》，從所反映的地域範圍上來看，都屬全國輿地總圖。從內容上看，《禹跡圖》的基本着眼點，是在宋代的政區圖上，反映《禹貢》所記載的上古地理，同時也繪有一小部分唐代以前的政區名稱，所以，圖碑題記說明其內容為：“《禹貢》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華夷圖》則是在宋代政區範圍的基礎上，一並反映周邊“四夷”的地

理位置。圖碑題記對於所編制四夷地理內容有說明云：“四方蕃夷之地，唐賈魏公（案即賈耽）圖所載凡數百餘國，今取其著聞者載之。”另據圖碑題記，《禹跡圖》乃齊“阜昌七年四月刻石”，時為南宋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葉氏所謂“開方記里”，即指此圖採用的編繪技術。“開方記里”又稱“計里畫方”，是用方格法表示地圖比例尺。《禹跡圖》的比例係“每方折地百里”。由於編繪時比例掌握比較準確，而且是傳世中國古代地圖中最早使用“計里畫方”法表示比例尺的實例，因而，在地圖學史上佔有特殊地位，並受到西方學者的高度評價^⑦。《華夷圖》圖碑題記，記述其刻石時間和地點，乃“阜昌七年十月朔岐學上石”，即比《禹跡圖》的鐫刻時間僅晚六個月。需要說明的是，葉昌熾所說的“開方記里”，只是就《禹跡圖》的繪製方法而言，與《華夷圖》無關。從比例的準確性來看，《華夷圖》遠不如《禹跡圖》。這兩幅地圖分別刊刻在同一方石碑的前後兩面，碑石今存西安碑林博物館。

至遲從清代中期的乾隆年間起，就有中外學者，對阜昌石刻《禹跡圖》和《華夷圖》，相繼做過研究，取得許多富有意義的成果。但是，仍有一些基本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索。



西安碑林藏阜昌石刻《禹跡圖》拓片



西安碑林藏阜昌石刻《華夷圖》拓片

一 《禹跡圖》與賈耽《海內華夷圖》無涉

清人畢沅，最早探討阜昌石刻《禹跡圖》的傳承淵源。乾隆四十七年，他在陝西巡撫任上，于西安刊印了其著錄關中金石文獻的著述《關中金石記》。書中說：

（《禹跡圖》）所載山川，多與古合。唐宋以來，地圖之存，惟此而已。考宋毛晃《禹貢指南》，稱先儒所刻《禹跡圖》，黑水在雍州西北，而西南流，至雲南之西南，乃有黑水口，東南流而入南海，中間地里闊遠。今此圖黑水與毛說合，是為宋以前相傳之舊也。

《唐書》稱賈耽繪《海內華夷圖》，廣三丈，縱三丈三尺，以寸為百里。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郡題以朱。豈此圖之權輿歟？^⑧

“權輿”本是草木萌生的意思，引申用為起始之義。所以，畢沅在這裏只是提出一種傾向性的揣測，認為阜昌石刻《禹跡圖》，可能受到唐人賈耽《海內華夷圖》的影響，他並沒有推定《禹跡圖》就是出自賈氏《海內華夷圖》。

然而，畢氏幕客洪亮吉在談到《禹跡圖》時，卻未再加以任何論證，便將這種十分模糊的看法，簡單表述為一個清晰的事實，徑謂之曰：“古圖今雖不存，然宋劉豫阜昌七年所刊《禹跡圖》者，尚屬賈耽相傳舊本。”^⑨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洪亮吉這一說法的影響，至1924年，王國維在專門論述這一問題時，乃明確提出，阜昌石刻《禹跡圖》是“出於唐賈耽《華夷圖》”。王氏論述說：

偽齊阜昌七年岐州學所刊《禹跡》、《華夷》二圖，石在西安府學。原跋云：“四方蕃夷之地，唐賈魏公所載，凡數百餘國，今取其著聞者載之。”是此圖出於唐賈耽《華夷圖》。

考《舊唐書·賈耽傳》，貞元十七年，耽表言：“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廣三丈，從（縱）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是賈圖所載東西三萬里，南北三萬三千里。此圖東抵新羅，西盡蔥嶺，南距安南、真臘，北不盡契丹，雖比《禹跡圖》稍稍增廣，而所圖僅方萬餘里，尚不及賈圖之半。故西域、南海諸國，僅於圖側附錄其名，且加省略。非貞元《華夷圖》之舊矣。

考賈氏原圖，廣袤極大，又於貞元中進入，至偽齊時殆已亡佚。《宋史·藝文志》別載賈氏《國要圖》一卷。蓋賈氏於所進圖外，又有略圖，其書著于《宋志》，蓋宋時猶有傳本。此圖所記西域、南海諸國名，或即出於此也。^⑩

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先于王國維四年，在1920年2月發表的《地理學家朱思本》一文當中，同樣推測阜昌石刻《禹跡圖》出自賈耽的《海內華夷圖》。內藤氏與王國維等稍有不同的是，他不是先假定阜昌石刻《禹跡圖》與《華夷圖》源自同一幅底圖，而是先行臆測阜昌石刻《禹跡圖》與《華夷圖》應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再由此進一步推論，《禹跡圖》自應與《華夷圖》一樣出自賈耽的《海內華夷圖》^⑪。與此相似，日本學者小川琢治在1928年出版的

《支那歷史地理研究》一書中，也認為阜昌石刻《禹跡圖》是由賈耽的《海內華夷圖》縮略而來^⑫。

隨後，開拓中國地理學史和中國地圖學史研究的王庸，又進一步坐實了二者之間的直接聯繫。20世紀30年代，王庸出版《中國地理學史》。在這部書當中，在沒有交待任何具體依據的前提下，王庸便斷然判定，阜昌石刻《禹跡圖》，係由賈耽《海內華夷圖》簡縮而來：

南宋刻石之《禹跡圖》，由賈圖縮制而畫方，可知賈氏原圖亦畫方也。

賈氏《華夷圖》不知何時亡失，但其縮本之《華夷圖》與《禹跡圖》，則于南宋時偽齊阜昌七年（紹興七年）上石，至今其石尚存于西安碑林。^⑬

至20世紀50年代，在所著《中國地圖史綱》中，王庸又敘述其論證過程云：

偽齊阜昌七年上石的《華夷圖》和《禹跡圖》，大概是根據賈耽的《華夷圖》輾轉縮繪的。因為《華夷圖》上刻著“唐賈魏公圖所載凡數百餘國，今取其著聞者載之”等言，又有建隆、乾德、寶元等年號，並稱契丹“即大遼國”，可見此二圖由宋遼人簡縮並輾轉改繪而成。又《宋史·藝文志》著錄賈氏《國要圖》一卷，可能賈氏除製《華夷圖》之外，另製簡縮的《國要圖》。這石刻的《禹跡圖》和《華夷圖》，或許就是由《國要圖》輾轉傳抄下來的。……總之，這二幅石刻地圖，和賈耽的圖有相當關係是沒有問題的。……這兩幅石刻地圖是現存的中國古地圖中最早的。現在我們還可以從這兩圖推想到前五百年賈氏原圖的輪廓。不過賈圖是一幅大圖，這簡圖卻分成《華夷》、《禹跡》兩幅，《禹跡圖》畫方而《華夷圖》不畫方。大概在輾轉摩繪縮製的時候，各取所需的結果：注意中原地理的，錄成《禹跡圖》，因為中原地理方位比較詳明，可以畫方；而四夷邊疆的方位不夠正確，注意邊疆四夷的，只能錄取其四夷輪廓，畫方沒有什麼作用，便縮繪成不畫方的《華夷圖》了。^⑭

從此以後，許多中國地理學史和中國地圖學史著述，不同程度地或明或暗沿承了這種說法。其中完全承用王庸觀點的有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學簡

史》^⑤、譚其驤為《中國歷史地圖集》所撰《前言》^⑥、盧良志編《中國地圖學史》^⑦等。另外，由於《禹跡圖》與《禹貢》研究具有密切關係，研究《尚書·禹貢》的學者，也對於這幅石刻地圖給予了很大關注。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者如劉起鈞，也同樣認為《禹跡圖》“係據賈耽圖中的中國部分縮製”^⑧。在日本學術界，增田忠雄在20世紀40年代初同樣提出有類似的看法，不過他並沒有展開具體的論述^⑨，而在織田武雄關於地圖學史的通論性著述當中，也作為通行的結論敘述了這一觀點^⑩。

通觀上述諸家看法，可以把他們推測或判斷阜昌石刻《禹跡圖》出自賈耽《海內華夷圖》的思路和理由歸納如下：

(1) 畢沅認為，阜昌石刻《禹跡圖》所繪《禹貢》黑水，與宋人毛晃稱引之“先儒所刻《禹跡圖》”相合，故阜昌石刻《禹跡圖》應是此“先儒所刻《禹跡圖》”的複製品，而這個“先儒所刻《禹跡圖》”，乃是“宋以前相傳之舊”。

(2) 《禹跡圖》既然源自宋代以前，而宋代以前的朝代即是唐代，唐

精當的看法。可是，在阜昌石刻《禹跡圖》與賈耽《海內華夷圖》的關係這一問題上，儘管曹婉如並不贊同畢沅、洪亮吉、王國維、王庸諸人的看法，卻沒有能夠針對上述核心問題，抓住畢沅等人論證過程中的關鍵邏輯支撐點，加以論辯；曹氏只是依據《禹跡圖》上的黃河河道與唐代河道的流向不同這一點，指出那種以為《禹跡圖》是根據賈耽《海內華夷圖》縮製而成的說法“有問題”^④。這樣的探討，完全回避了畢沅、王國維、王庸諸人論證過程中的核心論據，因而無法從根本上推倒他們的結論；況且，即使在繪製《禹跡圖》時，主要依據的是賈耽的《海內華夷圖》，地圖的繪製者，也完全可以依據宋代黃河河道的實際流經地點，改繪河道。事實上，阜昌石刻《禹跡圖》，就是這樣改繪了關中洛河的下游河道^⑤。因此，僅僅依靠黃河流路這一論據來否定畢沅等人的觀點，尚且遠不足以令人信服。事實上，曹婉如的研究，並沒有能夠解決阜昌石刻《禹跡圖》是否出於賈耽《海內華夷圖》的問題。

另外，日本學者榎一雄雖然沒有提出明確看法，但也認為《禹跡圖》究竟是否出自賈耽的《海內華夷圖》，還不易遽然斷定，尚有待進一步研究^⑥。

正因為如此，後出的相關著述，往往依舊作為一種重要學術觀點，舉述王庸的著述為代表，列出畢沅、王國維這一派的想法^⑦。顯然，目前已有的有限研究成果，並不足以證成或是否定畢沅以下諸人的觀點。要想真正解決《禹跡圖》與《海內華夷圖》的關係問題，就必須重新審視上述畢沅等人的三點基本理由，判別其是否能夠成立。

畢沅判斷，阜昌石刻《禹跡圖》出自毛晃《禹貢指南》稱引的“先儒所刻《禹跡圖》”，這一點很有見識。但是，毛晃所說“先儒”，是否一定為宋代以前的唐人，或是更早的學者，則還需要進行斟酌。畢沅沒有具體交待毛晃的行年，而約略與其同時的四庫館臣對此略有考訂：

晃，《宋史》無傳，其始末未詳。世傳其《增注禮部韻略》，於紹興三十二年表進，自署曰“衢州免解進士”，蓋高宗末年人也。^⑧

依此，毛晃為南宋初高宗時人。那麼，當時人所說的“先儒”，一定是指“宋以前”的唐代或是比這更早的學者麼？

事實並非如此。程大昌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行年與毛晃相若，也與毛晃

一樣，為當時研治《禹貢》的知名學者。程氏在所著《禹貢山川地理圖》的序文中，敘述其撰述體例時說道：“臣今稽求先儒舊說，……舊說既竟，乃出臣愚見，別為圖以綴其後。”而文中實際引述的“先儒舊說”，包括有北宋神宗（公元1068～1085年）前後的王安石、蘇軾等人的觀點^⑧。可見，對於高宗紹興年間（公元1131～1162年）的人來說，六七十年以前的北宋學者，是完全可以稱之為“先儒”的。所以，根本沒有必要一定遠到前朝亦即唐代去找尋毛晃《禹貢指南》稱引的“先儒”《禹跡圖》的作者。

曹婉如經過深入研究後得出結論說，阜昌石刻《禹跡圖》其上石底圖的繪製年代，是在北宋神宗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至哲宗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之間^⑨。如上所述，按照當時的習慣，毛晃完全可以把這一時期的學者稱之為“先儒”。如同研治中國地圖學史的學者衆所熟知的那樣，宋代依據這一底圖上石的圖碑以及留存至今的碑石，都不止一處。所以，《禹貢指南》提到的“先儒所刻《禹跡圖》”，應當是與此阜昌石刻《禹跡圖》內容完全相同的另一石刻圖碑或者拓本。如此一來，便排除了畢沅據以立論的邏輯前提。

畢沅謂《唐書》稱賈耽《海內華夷圖》“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郡題以朱”，這是援引《新唐書·賈耽傳》的記述。自從北宋修成《新唐書》並經朝廷頒行以後，經歷宋、元、明三朝，直到清朝前期，《新唐書》一直頂替後晉時劉昫領銜監修的《舊唐書》，佔據着“正史”的位置。南宋人所說“十七史”，明朝人所說“二十一史”，都只有《新唐書》而不包括《舊唐書》^⑩，因而《舊唐書》便很少有人閱讀利用。早在南宋時期，金人王若虛即感歎其書近乎廢置^⑪；明代學者中即使是以讀書淵博著稱的楊慎，也只是從他人著述中偶然窺知《舊唐書》一點點內容^⑫；胡應麟更明確講述說，自從《新唐書》行世，劉昫此書即被廢棄^⑬。清初博學多聞的大學者閻若璩，起初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書齋中亦僅能收有一部殘本，後來偶然“忽得其全”，才得以通讀全書，不禁感歎“如此等史學，豈不經天緯地”^⑭。從乾隆四年起，《舊唐書》雖然得以與《新唐書》相並列，躋身於“正史”之列，但一般清朝人涉及唐代歷史時，仍多引據《新唐書》^⑮。清人畢沅等捨棄《舊唐書》而用《新唐書》，正是緣於這一背景。

《新唐書》的撰述原則是“文省事增”，即“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

舊”^③，用比《舊唐書》減省的文字來記述比它更多的內容。想法雖好，做起來卻很難。刻意追求文字減省，往往會傷害文意，特別是會損失有價值的史料^④。這種缺陷，在宋祁執筆撰修的列傳當中尤為明顯。宋祁行文用筆，過分追求雕琢文句，自矜其所撰《新唐書》列傳，差可“自明一家”，傳之不朽^⑤，可是，正因為宋氏刻意“但做自家文字，故唐事或多遺漏，世以為不如劉昫之書為勝”^⑥。宋人劉器之最早評判云：“《新唐書》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⑦金人王若虛更激烈抨擊宋祁不明作史筆法說：“作史與他文不同，寧失之質，不可至於華靡而無實；寧失之繁，不可至於疏略而不盡。宋子京不識文章正理而惟異之求，肆意雕鑄，無所顧忌，所至字語詭僻，殆不可讀，其事實則往往不明，或乖本意。自古史書之弊，未有如是之甚者。”^⑧明人楊慎在對比部分內容後即做出結語道：“《舊書》所載，問答具備，首尾映照，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剪截晦澀，事既往，文又不通，良可慨也。”^⑨清人顧炎武乃將《新唐書》這一缺陷概括為“簡而不明”^⑩。可見《新唐書》這一弊病，自宋代以來已有定論。

在《新唐書》這些“簡而不明”的記述當中，特別是由於宋祁本人不喜歡對偶駢句，認為“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鞀鼓”，兩不相宜，因而，在纂述《新唐書》時，主張盡可能“捨對偶之文”，對這類文籍無不大加刪削^⑪，往往以其恣意過甚而致使文辭嚴重失實，賈耽傳中駢文的命運同樣也是如此。

《新唐書·賈耽傳》相關原文為：

（賈耽）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縱）三丈三尺，以寸為百里。並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⑫

上面引文的句讀均從中華書局點校本。按照這樣的讀法，《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以下的內容，應當與《海內華夷圖》無關。

不過，畢沅等輩當年閱讀《新唐書》時，也完全可以在“《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之下句斷。這樣，“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云云，就完全可以理解為是針對《海內華夷圖》

而言；至少是兼指《海內華夷圖》和《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二者。畢沅正是這樣解讀《新唐書·賈耽傳》的記述，從而得出了《海內華夷圖》包含有《禹貢》地理等歷史地理內容，並由這些內容，推導出阜昌石刻《禹跡圖》與賈耽《海內華夷圖》的聯繫。

那麼，究竟是中華書局點校本的解讀正確，還是畢沅的解讀正確呢？《舊唐書·賈耽傳》載有賈耽進呈《海內華夷圖》時所上表文，使用的文體，正是當時通行的駢文。與《新唐書·賈耽傳》相對比，知上面引述的《新唐書》文字，乃是由賈耽進書表壓縮點竄而成。因與此圖同時進呈的還有賈耽所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所以，在這篇進書表當中也講到了《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一書。表文開頭，包括如下三部分內容：第一部分，講四夷地理為古來通儒所難詳知；第二部分，賈耽講他本人自弱冠以來三十年間，一直注意尋訪記錄域外地理風俗；第三部分，講述唐朝華夏聲教被于四海，故有繪製《海內華夷圖》之必要。接下來的第四部分，就是對繪製《海內華夷圖》以及撰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的具體說明：

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答，夙夜兢惶。去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郡，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續用尚虧，憂愧彌切。

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叢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縱）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莫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繪。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

並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敘其衰盛。前地理書以黔州屬西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為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疏舛，悉從釐正。隴西、北地，播棄於永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陜北，晉氏遷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太半。《周禮·職方》，以淄、時為幽州之浸，以華山為荊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聞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

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鄼侯之圖書，方知阨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輒罄庸陋，多慚紕繆。⁴⁵

以上引文的段落劃分，是依照我對原文內容的理解（今中華書局點校本《舊唐書》，係連結為一個大的段落）。這樣不憚其煩地一一敘述賈耽進書表每一部分的内容，並全文引述以上具體說明《海內華夷圖》和《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的文字，是因為非如此便無法準確理解賈耽的本意⁴⁶。

仔細審讀上引賈耽進書表的内容，可以看到，其每一段文句所要表达的内容，是非常清楚的。第一段，賈耽講述他受詔修纂“國圖”的經過。根據上下文内容，這裏所謂“國圖”，應當是指包括周邊地區在內的唐朝全圖，賈耽繪製的《海內華夷圖》，就是這樣的“國圖”。第二段，講述《海內華夷圖》的形式和内容。第三段，講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的内容與書寫形式。第四段，結束語。對比進書表這些内容與畢沅據以立論的《新唐書·賈耽傳》，可知《新唐書·賈耽傳》記述的“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云云，原來均出自賈耽進書表中關於《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的敘述，而語義已經變得含混不明。如前文所述，賈耽進書表前三個部分的敘述，都是圍繞着《海內華夷圖》展開的，而在這些敘述當中，都只是談論唐代當時的四夷地理問題，絕然沒有提及要表达古代的情況；上引第四部分第二段，在講述《海內華夷圖》時，也只是說將用以“別章甫左衽，莫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繪”，顯然只是用來反映唐朝及其周邊各地，也就是“華夷”兩區的地理狀況，根本不涉及唐代以前的“歷史地理”問題。至於《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這部書籍，其内容則與《海內華夷圖》完全不同。

從賈耽進書表中可以清楚看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的撰述宗旨，就是要反映自《禹貢》以來歷代的地理沿革，所以才需要“今古殊文”，才會有“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這樣的表記形式。日本學者榎一雄雖然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注意到《舊唐書·賈耽傳》中的進書表要遠比《新唐書》完整，但令人遺憾的是，榎氏在分析這篇表文時，因理解不夠透徹，誤以為賈耽有關《古今郡國四夷述》的敘述，是從“中國以《禹貢》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開始，迄至“多聞闕疑，詎敢編次”終止，而錯把“其古郡國題以墨，